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DUNHUANGTUBO LISHIWENSHU KAOSHI



〔法〕A·麦克唐纳著 耿昇 译
王尧 校 青海人民出版社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法〕A·麦克唐纳著 耿昇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王尧校



UNE LECTURE DES PELLIOU TIBETAIN
1286,1287,1038,1047 ET 1290,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
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DE SRON-BCAN SGAM-PO
ARIANE MACDONALD
LIBRAIRIE D' AMERIQUE ET D' ORIENI
PARIS, 1971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法) A·麦克唐纳 著

耿昇译 王尧 校订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1 字数: 252,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ISBN 7-225-00041-1

K·4 定价: 4.00元

译者前言

法国当代著名女藏学家阿丽雅娜·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夫人,近年来因与其夫离婚改姓名为阿丽雅娜·斯巴尼安(Ariane Spanien)。她现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四系即历史和语言学系的研究导师。她自本世纪六十年代继玛塞尔·拉露(Marcelle Lalou)小姐整理藏文文献和从事藏学研究以来,藏学论著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如她于1962年、1963年在《亚细亚学报》发表的《论四天子理论在吐蕃的传播》、《〈汉藏史集〉叙说》,1967年在《西藏艺术论文集》发表的《五世达赖喇嘛的一尊雕像》,1967年和1972年在巴黎出版的《西藏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第1卷和第2卷等。此外还有对吐蕃王廷纪事文书和如来藏等方面的研究。她在居移法国的原籍安多地区的藏族学者允丹嘉措以及达布仁保旦的帮助下工作。她的著作受到了国际藏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藏文文献资料整理方面,麦克唐纳夫人的代表作就是她与今枝由郎、魏普贤(Helne Vetch)等人在石泰安(R. A. Steim)教授指导下编辑影印发表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文书选》(同时还以大英博物馆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敦煌藏文写本补充),已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出版了两辑。其余各辑正在陆续编辑。这批敦煌藏文写本原件

的影印发表，大大地推动了国际上对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

在论著方面，麦克唐纳夫人的代表作就是《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6、1287、1038、1047和1029号注释，兼论松赞干布王族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和使用》。由于其内容是研究数卷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并在巴科（Jacques Bacot）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940年巴黎版）一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所以一般均称它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本书最初以论文形式刊载1971年巴黎美洲和东方书店为纪念拉露小姐八十诞辰而出版的《藏学论文集》（*Etudes Tibetaines*。对此文集，一般又称为《拉露纪念文集》）。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藏学界的震动。法兰西学院藏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夫人于1973年为纪念法国亚细亚学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在《亚细亚学报》第3—4期中撰文指出，这是一篇“很全面的论文，它超越了历史范畴，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她从宗教中看到了汉族观念对吐蕃的影响，此著作在藏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布隆多夫人1979年10月间在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的发言中又指出，麦克唐纳夫人此文“动摇了到那时为止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有关吐蕃宗教的观点，法国当前对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她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见《亚细亚学报》，1981年第1—2期）

麦克唐纳夫人此文材料丰富，分析深刻，观点新颖。因为她使用的主要是一些非常宝贵的最为原始的藏文史料——敦煌吐蕃文书，这些资料大都不见于汉文典籍和晚期的藏文著作，所以更显得重要，尤其是对于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史更为如此。虽然其中充满着神话色彩，但由于敦煌写本是在事件发生

的同时或稍后不久写成的，因而比期晚的藏文著作含有更多的翔实内容。所以，此文可能对我国藏学界大有裨益，故我们将该文翻译出来，以供我国学术界参考。当我们把自己的翻译计划告诉麦克唐纳夫人之后，她十分高兴，多次来信指导帮助。

本书全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翻译，其中藏文和专业问题由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王尧解决，最后由王尧对全文作了校订。承书后译名对照表中的藏文及书中的藏文由青海社科院陈庆英处理。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王青山等同志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次

译者前言..... (1)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辞..... (1)

附:

参考书目 (259)

译名对照表 (334)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巴科(Bacot)、托玛斯(Thomas)和图散(Toussaint)于1940年翻译和发表了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8、1286和1287号,形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它始终是我们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自从该著作问世以来,先后有拉露(Lalou)小姐、博格斯洛夫斯基(Bogoslovsky)、伯戴克(Petech)、黎吉生(Richardson)、罗纳—塔斯(Roma Tas)等人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进行了新的探讨,重新翻译和解读了伯希和第1286和1288号敦煌藏文写卷的开头部分。石泰安(Stein)和乌瑞(Uray)也为澄清这些文书中的某些难题而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全面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了。鉴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我们也试图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6号和1287号中有关松赞干布在位前后发生的事件的那部分文字重新解读。我们从事这种解读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十一世纪以来有关这一赞普神话传说同我们所拥有的最为古老的(基本是与该赞普同时代的)资料进行对照比较。但是,如果我们首先直接把大事年表中的第11和第12两节归于松赞干布执政年代^[1]那就会遇到离原定宗旨太远的一些问题,不过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最终会把我们引向既定目标,而且还会开创出乎意料的新前景。

由巴科等人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发表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6号是一件宽二十五厘米、长九十二厘米的长卷，由三件残卷对接而成。第一件残卷（1286，1和2）本身的开始处就有剪接的痕迹，其上部是另一件卷子的几毫米长的残留部分。这就是说，卷子的前几行可能并不是真正开篇的地方。前五行（1286，1）有一部分尚可认读，前面附有一自然段开始的标志，接着又是相当于十五行文字的空白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没有收入这一部分内容，但拉露小姐在《封地、毒药和医生》第161页和《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目录》第3卷第2页中解读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文字。下面的三段，即第1286号写卷第2节第6—29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80—81页第6行），第3节第30—41行（同上引书，第81页第7—26行），第4节第42—69行（同上引书，第81页第27行至第82页末），前面各自都附有一个段落起始符号。前两段的后面有剪贴的痕迹，在行末又附有两条长竖线。第1286号写本第3件残卷中的第4节已经不太完整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其结尾处是吾东木赞，也就是朗达玛赞普的别名。笔者本人对于敦煌文书中藏文写卷的字体并不太熟悉，所以很难确定这四部分是否是同一人所抄写的，但后面三部分（第一部分不太明显）都是以精心书写的蝇头小字开始，然后越写越潦草，到了末尾字体就变得很大。因此，这三个部分即使是由同一人抄写的，那也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断断续续抄成，最后由辑录者、抄写者或其他什么人重新组合起来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不同的片断是否能在逻辑上和年代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呢？或者它们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独立文书，后来才被编纂者多少有点武断地拼凑起来的呢？巴科和图散似乎倾向于后

一种看法，所以他们才单独译注了各个片断，把它们当作互不相关的完整体。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对其中部分文字解读的结果证明他们的观点不为大谬，确实具有一定道理。

对于把这些卷子拼接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是在第1286号写卷第4节写成之后，即842年，也就是吐蕃最后一代著名赞普朗达玛在位的末年。但第1286号写卷第2—3节中所叙述的有关吐蕃第一位赞普自天界下凡的故事明显发生在此之前，虽然我们尚很难确定其具体时代。第1286号写卷第4节中的王统世系表仅仅说明，在九世纪时，从聂赤赞普到松德赞，即松赞干布时代，吐蕃一共有三十二代君主相继在位执政。根据本人对有关吐蕃王权时代开始阶段年代学的古藏文史料的探索所知，除此处之外，其它任何地方均未曾提及此点。然而，我们在古代汉籍中却见到了有关的记载。801年成书的《通典》〔2〕中有关于700年左右的一段文字记载〔3〕，《旧唐书》（见伯希和《吐蕃古代史》第1页）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它们都曾提到过南凉秃发利鹿孤，说前藏的吐蕃人均为其后裔。这种假设要追溯到一位赴汉地的吐蕃使节所提供的解释。事实上，利鹿孤的传说与支贡赞普的神话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后者是聂赤世系中的第七代赞普，也是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7号第1节中的主人翁。所以巴科先生认为可以为“利鹿孤（即支贡赞普）确定一个具体时间，而利鹿孤又于414年被乞伏炽盘（即罗阿木，也就是ལོ་འམ་ཏཱ་对音）所弑，后者也于427年逝世”（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6页注〔3〕）。本人曾就此问题而请教了召泰安先生，他很想根据伯希和讲学的

思路而翻译巴科所参阅过的《通典》第190卷吐蕃传开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或云秃发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辱檀为乞伏炽盘所灭，樊尼率余种依沮渠蒙逊”。石泰安先生向我指出：“北凉的沮渠蒙逊（401——412年临朝执政）与位于今甘肃的南凉的秃发乌孤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不属于羌族，而是属于突厥——蒙古族或通古斯族人。无论如何，他们终生都生活在凉州、甘州、肃州和敦煌地区”。石泰安先生最近又重申了他在《西藏的文明》第12页中所阐述的观点，并且还补充说：“我个人坚信人们把两个名词混淆了（同时有两个拓跋部，汉字完全相同，其一为吐谷浑，其二为羌），人所共知的Tübbüt一词等于‘吐蕃’，即由此而来”，这样看来，那种把利鹿孤（其它地方又被称为秃发乌护，而不象由《西藏的文明》所引用的两种汉籍史料中所说的那样是利鹿孤）考证为吐蕃中部的部分地区〔4〕的国王支贡赞普是一种臆断，它是以一系列的混淆为基础的，而且由于它们之间在历史上和传说中又具有某些相似性，这就更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这种混淆。因此，在缺乏其它任何史料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被迫参照晚期藏文史料中对吐蕃第一代赞普即位时间的假设，并且以此为据而形成有关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6号与其它史料中所记载的事实之间的时间年限的观点，而这种观点肯定又是不太确切的。在晚期的藏文史料中，价值最大的著作之一（尽管其史料来源尚不为人所知）是由北方之大师所提供的，此人就是1786年成书的《如意宝树史》〔5〕的作者，其史料引自1346年成书的《红史》。这部著作认为，在聂赤赞普与脱脱日年赞之间，一共度过了六百六十个春秋的光阴，但我们不知道这种计算法是从聂赤的登基计算到脱脱日年赞的诞生、即位还是

薨逝。书中还补充说，从脱脱日到松赞干布的诞生又有一百五十年的时光，因为该年表似乎是承认松赞干布诞生于公元557年这一火牛年〔6〕，所以聂赤赞普似乎是生活在公元 $660 + 150 = 810 - 557 = 253$ 年间，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很明显，这只不过是诸说之一。但这种观点似乎不象八思巴的说法那样过分武断。例如，后者在1278年成书的《彰所知论》中把聂赤赞普降临到吐蕃的时间推迟到佛陀进入涅槃之后的一千多年，把最著名的一次授记与脱脱日赞普时佛法传到吐蕃一事相提并论。根据这种授记，在佛陀进入涅槃之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教才传到赭面人国〔7〕，随着脱脱日赞普的降临〔8〕，又引起了在聂赤与脱脱日之间也有近一千五百年之差距，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西藏的许多非常熟悉情况的文学大师都认为聂赤是在佛陀进入涅槃之后才降临到吐蕃的。特别是巴俄祖拉陈瓦在《贤者喜宴》中更持这种观点。他用这一论据而驳斥了前人们的某些假设，尤其是集中抨击了《遗诏集》和《布顿教法史》（即《善逝教法史》——译者）中的假设。

巴俄祖拉陈瓦是在假设吐蕃第一位赞普起源于印度的范畴内考虑这一年代学问题的，晚期的传说把这一理论归于秘密法统的类别中。我们将于下文再回头来谈这种分类问题，因为在其它史料中就已经有记载了。据《文殊室利根本仪轨》〔9〕中有关授记的一段文字记载，巴俄祖拉陈瓦的假设也就是聂赤赞普自释迦牟尼族下凡的，后者出自于先祖乔达摩。一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之后，他便从事批判原先认为印度王子前往缔造吐蕃王朝的假设：“有些人曾写道，吐蕃的第一位国王是频毗娑罗，而其他人又认为是乔萨罗钵罗犀那特多国王，也有人认为是尚达·帕罗德尤塔或乌陀愆那〔10〕，还有人认为是在佛教

缔造人释迦王降世之后的五位盘度族人之一；甚至也有人认为是鲁帕提，在一篇经文中还存在有对他的授记。据学问渊博无比的布顿认为：“据一篇赞文的疏注记载〔11〕，所有的吐蕃人都是鲁帕提的后裔，而吐蕃赞普既可能是乌陀愆那的儿子，又可能是钵罗犀那恃多的儿子，前者是婆梭罗的国王，而后者是侨萨罗的国王。还有人认为吐蕃赞普是周罗跋罗〔12〕五位儿子中的第三位〔13〕，也就是频毗娑罗最为年幼的儿子，他天生有非常明显的肤记，即长有带蹼的手指，因为其父母害怕这是一种恶兆，便将他关闭在一个封口的铜容器里抛入江中。恰遇一批农夫把他打捞搭救出来并哺育长大成人，但由于他感到失望，稍后不久就逃走了，后来他被任命为吐蕃赞普”。对于这一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它们均不太确切。

巴俄祖拉陈瓦确实是一古脑儿地排除了上述所有种种假设，其原因如次：有人意欲把吐蕃第一位赞普的起源追溯到五位盘度族人之一，即《摩诃婆多罗》史诗中的主人翁，他在释迦牟尼诞生后不久就出现了，这种作法是谬误的，因为盘度族人在释迦佛诞生之前很久就在那里休养生息；还有一些人企图把聂赤赞普考证成频毗娑罗、钵罗犀那恃多或与佛陀同时代的其他国王，这更是大错而特错了。首先是因为这四位印度国王〔14〕均不是出生于释迦家族，其次是由于他们与佛陀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有些人还是早于佛陀而归天，这样就否认了那种所谓聂赤赞普生活在佛陀进入涅槃之后时代的诡称。那种认为聂赤赞普是频毗娑罗的孙子、天生手指带蹼之类的假设也应统统抛弃，因为我们不可想象婆罗门信徒们会把这种本来是很吉祥的预兆看作是恶兆，更何况婆罗门信徒既是为国王管理寺院的

教长，又是占卜术大师，所以他们不可能犯如此明显的错误。其次，智慧铠在对《胜过天神》的诠释中声称，从前，在五位盘度人和俱卢族人之间爆发一场战争时，鲁帕提国王率一百多名士兵乔装改扮为女子而逃到了吐蕃，从此便在那里扎根繁衍起来了〔15〕。但他们并不是全部吐蕃人的真正始祖，因为如果把鲁帕提国王考证为聂赤赞普，那就会与另一事实相矛盾，即在该国王到达吐蕃之前，吐蕃地区就已经有其它人种居住了（他们后来成了该国王治理下的臣民，因为根本不存在没有臣民的国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鲁帕提国王很可能不是聂赤赞普，因为吐蕃的王统世系并非出自于释迦氏系（因此盘度人的将军鲁帕提也不属于这个家族）。据巴俄祖拉陈瓦认为，上引那篇赞文的作者把吐蕃（ཁུ་）一名与附近的门（མུ་）族地区相混淆了，后者的发音与（ཁུ་）颇为相似。最后，历史学家噶玛巴也摒弃了这最后一种假设，即认为鲁帕提可能是夏达尼卡国王的第一百子，他与盘度族国王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佛陀诞生之前很久的时代。在由盘度五部人屠杀鲁帕提国王诸子时，唯有这第一百子逃脱了恶劫，但却被他们关在一个铜箱子里抛入了江河之中，在经过与布顿所说的那位手指长蹼的王子相同的曲折经历之后，他变成了吐蕃赞普。巴俄祖拉陈瓦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吐蕃第一位赞普是在佛陀进入涅槃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的。这一论据是以某种吐蕃纪年著作为基础的，而这种年代学著作又与北方大师所使用的那种著作特别相似。巴俄祖拉陈瓦在《贤者喜宴》第6页中确实曾指出，《拉萨大诏令集》〔19〕（又称《大昭寺志》）解释说，在聂赤赞普与脱脱日之间有五百年的时光，脱脱日可能高寿到一百二十岁。在脱脱日与松赞之间，共有四代

蕃王，长达一百一十一年之久。“由此可见，只是在佛陀进入涅槃多年之后吐蕃才有了一位国王。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夏达尼卡的儿子鲁帕国王和由巴俄祖拉陈瓦所引著作中提到的其他印度王子在佛祖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很明显，释迦牟尼那位身上具有许多吉祥标记的儿子后来成了吐蕃赞普，而且还是在佛陀进入涅槃之后很久才降临到吐蕃的”〔17〕。

这一段文字意义非同小可，特别是对于了解吐蕃史编纂学则更为宝贵。因此，它向我们说明《拉萨大诏令集》这部成书时间尚不太肯定的藏文史籍，却被某位精通古老或晚期藏文文献的历学家认为是最为真实可靠的一部史著。此人如同巴俄祖拉陈瓦一样，也把此著作考证为吐蕃第一位赞普执政年间成书，其时间（只能是约估，因为现在尚很难确定松赞诞生的具体年代）为公元 $500 + 120 + 111 - 557$ （617），即公元前二世纪。这样一来，它与《红史》中所使用的年代学就相差无几了。如果相信上文所提到的那些藏文史料的话，那末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6号所记叙的就是距其编纂时间之前一千多年的事件，也就是吐蕃有文字之前八百多年的事件。所以，从推理来看，此著作中对降临到吐蕃的第一位赞普的说法不可能具有太大史料价值，它似乎是对七一九世纪吐蕃王权开始时代的再现，其主要意义仅在于提供了一些当时所流行的有关吐蕃第一位赞普神性起源观念的资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到，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6号四大段的基本构成如下：

一、第一段中共包括有五行文字，其解读情况如下（本人

种进行分类的角色；在同一篇文书中还会发现岱氏家族的一名贵夫人，其作用与前者雷同，其名字也与前者相似，叫作岱萨·噶喀尔。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和不容置疑的：后三个专有名词“几曲”、“达布”和“缙”既具有地名的作用，又具有氏族名称的特点。在由拉露小姐所编制的珍贵史料《古代吐蕃小王国国名录》中，它们均以这种形式而作为小王国国名出现。几曲既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又是拉萨地区的名字〔24〕。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从五世纪左右的没庐·年岱茹〔25〕时代起，该氏族一直向吐蕃赞普进献皇后（伯希和第1286号敦煌写本第4节），在本处被用作“地区”之意。达布一地肯定在拉萨以东的达布地区，虽然在拉露小姐为编制其小王国国名录而使用的文献中，当记叙到南日论赞征服达布时，其首府的名字既叫“四方四正”（ཁྱུ་འཕྱོགས་པ་ལྔ་པ་，又叫辛奈，མིང་མཁོ་ལྔ་པ་），这里当然是指对达布地区的森喀尔〔26〕的进攻（见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87号，巴科等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107页；第13行）。

对于岱地来说，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正如拉露小姐在《封地、毒药和医生》一文第161页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术语于本处具有地名的作用，因为它与另外三个名词并列使用，所以也会使人将它也看作是一个氏族名称。但“冰川地区的岱”似乎同样也是神名，雅砻地区的居民就是这些神灵的后裔。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5号卷本身就首先证明了岱地或岱族人的具体位置，该卷子提供了各不同小王国的医学专家们治病的许多先例。这一文书正面的第3段阐述了岱地的治病史，该地区位于雅砻一带，即雅砻索格地区〔27〕，雅泽恩么河（也就是雅砻的清江）就流经那里。